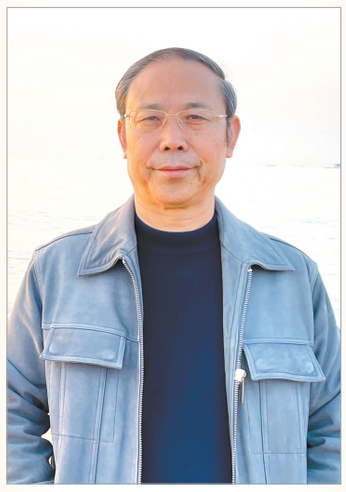
从乡土到海洋的文学长征 为时代留存记忆的温度

■受访人：赵德发（作家、山东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）
□采访人：张佳璇（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）



从鲁南乡村到黄海之滨，从土地情结到海洋情怀，赵德发的创作轨迹勾勒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精神图谱。本次专访中，我们看到了一位毅然放弃仕途、执着追寻文学梦想的写作者。从《缱绻与决绝》到《大海风》，赵德发根植厚土，笔写苍生。在社会变革的宏阔图景下，他从个人命运切入，书写被大历史忽略的鲜活细节，为时代保留记忆温度。在他笔下，无论是土地上耕耘的农民还是大海上拼搏的渔家，都闪耀着中国人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的精神光芒。

□你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？从卸任莒南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到进入山东大学作家班深造，这段转变对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？

■我24岁那年，在乡村任教师时偶然读到文学刊物，萌生了“今生要当作家”的念头。那时我家境贫寒，需挣工分，只读了4个月初中即辍学，学历很低，完全是“不自量力”。多亏15岁当上了小学民办老师，让我重新亲近书本，于是拼命读书，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。23岁考上公办中学语文教师，对文学的强烈热爱推动我业余创作，屡败屡战。后来我进入仕途，曾任公社秘书、县委办公室副主任、组织部副部长，但始终放不下文学梦。1988年，我在33岁时毅然放弃职务，通过成人高考进入山东大学作家班深造。那是我人生的“一步险棋”，许多人反对，但我坚信必须走这条路。

在山东大学的两年，我终于写出了比较像样的作品，短篇小说《通腿儿》获得《小说月报》第四届百花奖，可算是真正圆了作家梦。没有山大作家班的学习经历，就没有今天的我。

□《缱绻与决绝》是你长期深耕乡土题材的展现，是什么契机让你将笔触从“土地”延伸至“海洋”（《大海风》）？这两部作品最初的创作冲动源自何处？

■我生于鲁南农村，30多岁才离开家乡，积累了大量素材，对土地和农民有深刻认知。1993年我意识到应该写长篇小说，大规模、大体量地表现农村和农民。因为我发现，中国的农民到上世纪90年代，已逐渐进入终结阶段，再过一段时间，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可能不复存在。1995年我写《缱绻与决绝》，是想记录传统农民与土地关系的重大变化——老一代农民对土地无比“缱绻”，新一代却“决绝”离开。

后来我定居日照，面对大海沐浴海风，倾听大海涛声，萌生了写海洋题材的愿望。但早期积累不足，直到2021年才开始动笔写《大海风》。这本书聚焦20世纪上半叶中国北方渔业史与航运史，通过渔家子弟实业救国的故事，展现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。

□从“乡村”到“海洋”，创作题材的转型挑战大吗？你如何克服“隔行如隔山”的困难？

■挑战很大，因为我是农家子弟而非渔家子弟。我多次深入渔村、港口，从长江口走到鸭绿江口，参与渔业劳动，还在养殖场挂职。同时研读大量文献，通过多年的探访与积累，逐步熟悉了渔业与航运。

□《大海风》聚焦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北方的渔业史与航运史，为何会选择这个相对小众的历史时段作为写作背景？你希望通过这本书展现怎样的历史文化风貌？

■这一段历史风云变幻——晚清政府垮台，中华民国成立，军阀混战，盗匪横行，民不聊生。中国处于一个非常危难的阶段。当时，一些有识之士寻求革命或改良，另一些人则尝试教育救国、实业救国。

《大海风》的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位人物：作为一名渔家子弟，他立志学习晚清状元张謇，以实业振兴民族航运。那时中国的航运业几乎被外国轮船垄断，本土力量非常薄弱。他一步步从置办大风船开始，后来购得六艘轮船，在青岛创办轮船行。就在他事业艰难上升时，日军全面侵华，逼近青岛。他响应政府号召，毅然将全部轮船沉入胶州湾航道，以阻挠日军进攻。

我希望通过这本书，展现那个动荡年代的历史样貌和渔家风情，讲述航海故事和民族实业家的奋斗，同时反映东西方文化在当时的交流碰撞。比如，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在青岛创办礼贤书院，不仅传播西方文化，还将大量中国文化经典翻译至西方，促成“东风西渐”。《大海风》试图以广阔的社会面，尽可能全面呈现那段历史的文化风貌。

□原著名为《缱绻与决绝》，而电视剧改名为《生万物》。这一改动有何特殊意义？你觉得哪个名字更能体现作品的核心价值？

■我的原著《缱绻与决绝》，意在表现两代农民对土地的不同情感：老一辈对土地“缱绻”不舍，年轻一代则“决绝”离去。电视剧主要取材于小说的前半部分，侧重刻画老一辈与土地之间的深厚情感，并未过多涉及“决绝”的内容。因此，采用《生万物》这个新名字更为贴切——它突出土地孕育万物、生生不息的力量，既符合剧中主题，也融合了传统文化中“三生万物”的哲学内涵。我认为这个改动是恰当的，它更精准地反映了剧集所表达的核心。

□你在《大海风》中描绘了航运业的奋斗者，这些奋斗者的精神内核，与你笔下传统的农民形象有何异同？是否存在一种一以贯之的、属于中国人的奋斗精神？

■航运业的奋斗者身上体现的，正是中国人历来所信奉的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精神。他们兢兢业业、坚韧不拔地投身于自己的事业，这一点与我笔下的农民形象是相通的。就像《缱绻与决绝》中的农民封大脚、宁绣绣等人，他们同样不甘于被命运安排，不断与生活抗争，为了更好的未来而不懈奋斗。这种自强不息、努力改变命运的精神品质，是一以贯之的，也深深植根于我们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。

□你作品中的女性角色（如绣绣、费左氏、翟慧）极具生命力，为何聚焦女性叙事？

■女性在不同时代都有坚强卓越的代表。她们的故事既能传递精神力量，也让作品更丰富动人。我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各有特色，不同的命运令人唏嘘。

□从《缱绻与决绝》到《经山海》，再到《大海风》，你的写作轨迹几乎与中国近几十年的社会巨变同步。你是否有意识地扮演着“时代记录者”的角色？相较于其他媒介，文学在记录时代方面的其不可替代性在哪里？

■是的，文学离不开时代，也应当表现时代。作为一名作家，我确实有意识地承担起记录时代的责任，我的小说创作也始终带有这样的特点。

文学在记录时代方面最大的不可替代性，在于它能够为历史保存鲜活的细节。历史著作或许能清晰勾勒发展脉络，但往往是概括和线条式的——例如提到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，促进粮食增产”，却很难呈现政策落地过程中人们具体的喜怒哀乐、矛盾与希望。

文学恰恰能写出那些被大历史忽略的细节。比如我在《缱绻与决绝》中写道：几家农户合用一头耕牛，都抢着先用，牛不堪重负，竟把扶犁的农人抵死；又比如生产队分配集体财产，最后一个电灯泡大家都不知如何分，队长干脆踩上凳子摘下来摔碎。这表现了农民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的真实心态。

这些细节，是历史书无法传递的。历史书只记录脉络，文学的价值在于为时代保存细节，文学正是通过细节的描述，留下鲜活的人物、故事与情感。为时代留存记忆的温度与厚度，是它独特的意义所在。

□作为《生万物》的原著作者，你对中国的粮食安全、乡村振兴和农业的未来产生了哪些新的思考？你希望文学能为这些宏大的时代议题带来怎样的影响？

■《生万物》在央视热播后，促使很多观众重新关注农业、农村和农民问题。

如今，不少年轻人对粮食的来源已经缺乏感知——饿了可以点外卖，回家就有饭吃，很少有人认真去想这些食物究竟从何而来。但土地才是生命的根基。这部剧让更多人看到，过去农民“土里刨食”何其艰难。即便今天农业科技、化肥、种子进步了，产量提升了，我们依然要保持忧患意识，居安思危。中国有数量庞大的人口，一旦遇到自然灾害或粮食减产，就可能导致严重的危机。因此，我们必须重视国家强调的18亿亩耕地红线，善待土地、珍惜资源，让我们和子孙后代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。

同样，乡村振兴的核心问题也离不开土地。只有把土地利用好、权益关系理顺、让土地真正产生效益，才能吸引人留在乡村、建设乡村。只有土地有活力、有产出，乡村才能有希望，振兴才不是一句空话。

文学的作用，正是通过真实的人物、动人的故事和细腻的细节，唤起人们对这些重大议题的关注与共情。它不像政策文件或统计数据那样直接，却能以情感和叙事的力量，让读者重新思考土地、粮食与乡村的价值。

当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与书法家王振相约“吃茶去”，一场跨越5载、行程30万公里的对话就此展开。《放宽心 吃茶去》这部新作，以最中国的“茶”为媒，以最生活的“聊”为径，在散文、诗歌、书法与摄影的交融中，为我们这个被按了快进键的时代，提供了一味清凉的解药。

两位作家，一个用笔尖捕捉文字的温度，一个用墨色晕染书法的气韵，却在喝茶这件事上达成了共识：茶要慢慢品，字要慢慢写，生活要慢慢过。从北京颐和园到英伦莎士比亚故居，从山东胶州茶摊到非洲大草原，他们用一杯茶的时间告诉我们：“放宽心”不是逃避，而是在快节奏中学会给自己留白的能力。

这本书不仅是一场文学与书法的跨界对话，也是一次对中国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诠释。它让我们看到：茶不只是饮品，更是连通古今的生活哲学；书法不只是艺术，更是安顿心灵的生命实践。在这个充满焦虑的时代，或许我们都需要学会“吃茶去”的智慧——停下匆忙的脚步，给自己泡一杯茶，在茶香中重拾生活的本真。

莫言与王振的“两块砖”茶话：在快时代里寻找慢下来的勇气

■受访人：王 振（书法家） □采访人：张佳璇（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）

□你与莫言联袂出版了新作《放宽心 吃茶去》，能否分享下这次合作的契机？最初是如何发起的？

■说起来挺“随性”的——我和莫言老师开《两块砖墨讯》公众号5年，跑了30万公里，从黑龙江零下38度冻得笔都握不住，到非洲草原与鳄鱼“隔岸聊天”，再到莎士比亚故居扒着窗台琢磨“他当年写剧本喝不喝茶”。走累了就找个地方喝茶，聊着聊着发现：现在人活得跟被按了快进键似的，连喝口茶都慌慌张张。莫言老师突然说：“咱俩把这些‘喝茶聊天的两块砖话’整理整理？说不定能让大伙儿慢半拍。”就这么着，没什么宏大计划，跟俩老头凑一块儿晒晒太阳唠嗑似的，《放宽心 吃茶去》就“泡”出来了。

□本书采用了散文、诗歌和摄影等多种艺术形式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内容，这种跨媒介表达背后有哪些考量？在不同元素的运用上如何考虑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与补充？比如，如何让文字与书法相得益彰，更好地展现主题？

■我们俩都怕“单调”——要是光写字，读者该犯困了；光放照片，又跟看旅游相册似的。就想搞个“热闹又不乱”的组合，比如写云南凤庆的茶摊，莫言老师用散文写摊主游小妹的憨笑，我就配幅行书，笔意软乎乎的，像姑娘递茶的手；去凤凰古城拍了沱江的晨雾，我题句小诗“雾里茶烟绕，船轻过石桥”，再用小楷写在照片旁边，跟给画儿题跋似的。文字是“说事儿”，书法是“传情”，照片是“留影”，三者凑一块儿，就像一桌菜：散文是主菜，书法是调味的酱油，照片是点缀的葱花，少了哪样都差点意思，合起来才够“下饭”。

□本书共分为5章，在章节编排上是否隐含着叙事逻辑或情感递进关系？是否特意安排以形成对比或呼应效果？让你印象最深刻的创作故事是什么？

■章节编排与“喝茶的节奏”差不多：第一章是“刚坐下”，写些轻松的日常，比如在自家阳台喝茶练字；后面慢慢“入了味”，聊历史、聊文化，最后一章又回到“平常心”，跟喝完茶拍屁股走人似的，落个“简单”。印象最深的是写邹平醴泉寺那段，当时我和莫言老师爬山路去看醴泉，草都快没过膝盖了，他突然说：“范仲淹当年在这儿苦读，路比这难走多了，人家还能‘划粥断齑’，咱们现在喝着热茶逛古迹，还有啥可焦虑的？”后来写这段时，我特意把他这句话用书法写得歪歪扭扭，像在山路上走的脚印，旁边配了张醴泉的照片，水汽蒙蒙的——就是想让读者感觉到：“放宽心”不是凭空来的，是从历史里、从脚下的路里品出来的。

□唐代赵州禅师便有“吃茶去”的著名公案。在你看来，身处今天这个快节奏、充满焦虑的时代，我们重新提倡“放宽心，吃茶去”，最重要的现实意义是什么？

■现在人都跟“被鞭子赶着跑”似的：上班赶地铁，下班赶做饭，连刷手机都得赶热点。赵州禅师说“吃茶去”，不是让你真去当和尚喝茶，是让你“停一停”，就像你跑步跑岔气了，停下来喘口气。现在提倡“放宽心”，就是想让大伙儿明白，不是所有事都得“马上成”，不是所有东西都得“比别人好”。比如你加班到半夜，别光想着没完成的工作，泡杯茶，喝一口，想想“今天至少把XX干完了”；陪孩子写作业，别光吼他慢，给他倒杯果汁（小孩别喝茶），自己也喝口茶，想想“他比昨天进步了一点”。“吃茶去”的意义，就是在“快”里找个“慢的锚点”，别让自己被生活“带跑偏了”。

□书名中的“茶”不仅是一种饮品，更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。为何选择这个符号作为贯穿全书的关键元素？

■选“茶”是因为它最“不装”——你说琴棋书画，好像离普通人远了点；但茶不一样，老百姓早上泡杯茶，老头在公园下棋也带壶茶，连赵州禅师都跟人说“吃茶去”，它是文化、是哲理，更是日子。在书里，茶的角色也不一样：写日常时，它是“陪伴”，比如写北京胡同里的茶摊，茶是街坊聊天的由头；写历史时，它是“纽带”，比如聊范仲淹，就提他苦读时喝的粗茶，连带着把“先忧后乐”的劲儿也带出来；写国外时，它是“桥梁”，比如在莎士比亚故居喝红茶，对比中外的“慢文化”。除了茶，还有书法、古诗词、老字号茶器，比如我写《学周越》的诗，莫言老师就聊周越的书法，都是想告诉读者：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些东西，不是摆着看的，是能帮你“放宽心”的——你写写字、品品茶，心自然就静了，这不比瞎焦虑强？

□你认为《放宽心 吃茶去》在艺术表现上有哪些创新之处？它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了哪些新的思路和方法？

■创新就在于“不端着”——以前很多书要么纯文学，要么纯艺术，跟读者隔着层“玻璃”，我们想把这层玻璃敲碎。比如书里没有“高大上”的理论，全是“接地气”的事儿：听风了，看雨了，看大鸟叼来小虫喂小鸟了，趴在沙丘等日出了，讨论哪个字是什么写法了……但这些小事里藏着“大道理”。

还有就是“跨媒介不分家”：不是文字归文字、书法归书法，而是书法跟着文字的情绪走，照片跟着场景走，就像一家人过日子，谁也不跟谁“抢戏”。可能给当代创作也提个小思路：别总想着“我要创新”，先想想“生活深处有真趣”，把复杂的道理揉进日常里，比喊口号管用多了。

□这次文学与书法的结合，是否为你未来的创作打开了新思路？是否有计划继续在“文学+”这个方向上进行更多探索？

■肯定打开了！以前我总觉得“书法是书法，文学是文学”，现在发现它们俩能“搭伙过日子”，叫文墨共生，还过得挺舒服，生出好多枝芽。以后想试试“书法+游记”，比如再跟莫言老师出去走，我不光写字，还把路上的小事记下来，像“旅行手账”似的；也想试试“书法+老故事”，比如把邹平的传说、黄河的故事，用书法写出来，用画表达出来。“文学+”不是“瞎混搭”，而是“找朋友”——找个能跟书法“聊得来”的伙伴，一起把故事讲得更好听，这比我一个人“闷头写字”有意思多了。

□近年来，像莫言等很多作家开始研习书法，你对此现象有何看法？

■这是好事，就像老饕不光爱吃，还想自己学做饭——作家本来就懂文字的“美”，练书法能更懂文字的“骨血”。莫言老师写文章，字里行间有“劲儿”，他练书法后，再写“先忧后乐”，就能更体会范仲淹的那份“硬气”；反过来，练书法也能帮作家“静下来”——写东西卡壳了，练练字，墨一蘸、笔一拉，心就沉了，说不定灵感就来了。而且这也能带动更多人喜欢书法，年轻人看到“莫言老师都练字”，可能会想“我也试试”，这就把书法的火苗传下去了，总比天天刷手机强。

□你和莫言一起投身于救助先心病患儿的公益事业中，可以详细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吗？目前已经筹集到多少善款？帮治了多少名患儿？在公益事业的进程中有什么令你难忘的事？

■我和莫言老师搞这个公益，初衷特别简单：看到有些孩子因为先心病，小小年纪就受罪，家里还没钱治，心里不是滋味。我们主要是通过义卖书法作品、联合公益机构筹款，到现在大概筹集了2000多万善款，救治了快1000个孩子了——每个数字背后，都是一个能重新跑跳的小生命，这比啥都值。

最难忘的是去年在山东聊城见的一个孩子。当时他刚做完手术，还不能下床，就攥着我的手说：“爷爷，我好了能跟你学写字吗？”我眼泪一下就下来了，对他说：“等你能跑了，爷爷教你写‘黄河’，写咱们家乡的字”。现在这个孩子已经上学了，还寄来他写的“黄河”，歪歪扭扭的，但特别有劲儿。做公益不是“给钱就完了”，是给这些孩子“活下去、活得好”的希望，当然更重要的是孩子给了我们希望，给我们带来了帮助人之后的幸福感，这才是最珍贵的。